



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中央督导进行行前培训 陈文清强调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传导压力 落实责任
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走深走实

新华社北京电 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中央督导日前在京进行行前培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决策部署,通过督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传导压力、落实责任,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走深走实。陈文清要求,要通过督导推动各地牢牢把握扫黑除恶斗争正确政治方向,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推动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群众呼声,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充分展示党中央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决心。陈文清强调,要明确督导重点,着力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切切实实让人民群众看到督导成效。要聚焦重点线索核查、重大案件攻坚情况开展督导,推动各地打深打透。(下转第2版)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可见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法治进步成就综述

□ 新华社记者 白阳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适应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

推动中国之治迈入新境界

浙江杭州,“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一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展品前,不少游人静静驻足观看。

1954年6月14日宪法草案正式公布后,共有1.5亿余人参与讨论,提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的诞生,见证了新

中国法治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道路决定命运,旗帜锚定方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到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回望峥嵘历程,一条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线清晰可见。

新时代的中国,跃上新的起点,也直面新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来推进,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

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首次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科学内涵;首次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和总体布局……习

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出台法治中国建设“一规划两纲要”,勾勒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施工表”“路线图”;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法治建设从法律体系向囊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法治体系全面提升……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之治迈入新境界。

充分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文件,被视为我国首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出生证明”。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由此走上历史舞台;40年后,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外商投资法,成为新时代我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通过宪法修正案,制定民法典、网络安全法、粮食安全保障法……截至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超过300件,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不断加强,以法治之力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社会预期。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始终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3个行政区组建的天津滨海新区曾经部门林立、公章繁多。2014年,滨海新区依法组建全国首家行政审批局,将原本分散在18个单位的216项审批职责归至一个部门,率先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

“以前施工项目遇到临时占用林

地和采伐林木的问题,要和林地所属、管理等单位反复沟通;现在只花费一周多时间就解决了问题,项目进展比预期大大提前。”天津市滨海新区城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荣鑫感慨道。

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法治保障就跟到哪里。

以中共中央名义出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顶层设计,人民法院加大甄别纠正涉产权案件力度,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执司法标准……让恒产者有恒心;

公布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实地督察……用法治的缰绳驾驭权力的奔马;

对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进行集中清理,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取消调整与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部分罚款事项,部署开展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激发创业干事的市场活力。

(下转第2版)



9月14日,曲阳县人民检察院干警来到驻村工作队驻地范家庄乡武家湾村,为孩子们送上法治教育课及节日祝福。检察干警结合实际案例,为孩子们讲授自我保护知识,增强了孩子们的法治意识。随后,检察干警以猜灯谜的形式向孩子们介绍了有关中秋节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并为孩子们送上了文具盒、文创书包等礼品。

高璐 杨曼 摄



“尽最大努力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完毕”

记者走基层

□文/图 河北法治报记者 刘彬

“法官,我不是有意不还钱,我现在生病住院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不信你看我的费用单子,我都带来了,每个月的治疗费用都是借的。容我一段时间,我一定把钱还上。”

9月11日,记者刚刚走进易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冯鲲鹏的办公室,就见到了正在哭泣的方某。原来,被执行人方某与申请执行人李某某是多年好友,二人之间因2万元借款纠纷,李某某将方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后,方某一直未偿还借款,李某某申请执行。

“方某,你的情况确实有些特殊,我们也了解过了,我让申请执行人到法院来,一起坐下来,把你们的事情说说,看看怎么解决。”说完,冯鲲鹏给申请执行人李某某打了电话。

在等待申请执行人李某某的同时,冯鲲鹏又在调解另外

一起涉农农民工工资案件。冯鲲鹏向被执行人释法明理后,劝说道:“农民工勤勤恳恳跟你一起打工,与你在一起干活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多,不是家人胜似家人。而且临近中秋节,他们也都想拿着工资回家与家人团聚。”被执行人羞愧地低下了头,当场打电话,将所欠农民工工资一次性汇入法院账户,由法院对未收到工资的3名农民工统一发放。

这起涉农农民工工资案件刚刚得到化解,申请执行人李某某就来到了法院。冯鲲鹏立即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我也知道你现在的困难,法官也在尽力给咱们解决问题。这样吧,只要你这次能在咱们说好的时间内把钱还了,我就再退一步,给你几天时间。”李某某理解方某现在住院的情况,但是自己家中也并不富裕,同样需要这笔钱。

“方某,李某某借钱给你是出于信任,有借有还才能再借不难。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人



图为冯鲲鹏对执行案件当事人劝说调解。

家帮了你一把,你本应该早就还钱,却拖欠至今。现在人家愿意再退一步,这次你一定要及时还,诚信做人,以后才会有更多来往。”冯鲲鹏进一步劝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方某先给付李某某5000元,剩余欠款分别在9月底、10

月底前给付完。

案件调解成功后,冯鲲鹏对记者说:“我们始终秉承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尽最大努力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完毕。对于逃避执行的‘老赖’,我们也会采取强制措施,以执行的力度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物业纠纷折射基层治理焦点难题



□ 曹永学

上海康城是上海市单体最大的社区。近日,上海康城业委会组织居民投票,以超过70%的支持率炒掉了已服务10年的在管物业公司。(据《上海法治报》报道)

这一新闻事件,再次把人们关注的目光引向物业纠纷领域。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联结社会民心。而现实生活中,服务不规范、监管不到位、业委会成立难已成物业管理的三大焦点问题。

上海康城社区通过业委会组织居民投票,依法终止居民不满意的物业服务,应该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城市社区处理物业纠纷的范本。但是在当前,在很多城市的多数社区,还难以达到这样的治理水平,因为绝大多数社区还没有建立业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更多的情况是,当居民对物业服务不满时,缺乏合理、有效的方式进行沟通、协调,从而选择拒缴物业费进行消极抗争。

近年来,物业纠纷高发,据个别法院统计,已居诉讼量前列。为推动物业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居住生活需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央政法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各地将小区物业管理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石,不断推进物业管理与基层社区治理融合。

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被称为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然而在治理实践中发现,“三驾马车”有“两驾”存在问题——物业公司是“隐患马车”,业委会是“跛脚马车”。

首先看物业公司的问题隐患。据相关统计,目前我国大约超过70%的物业企业属于开发商的下属机构,开发商与物业企业虽是两个法人,实际是一个背景,一旦房屋过了保修期,或者业主

更换了物业公司,房屋质量问题只能由业主自行兜底,大量开发商遗留问题因此成为物业投诉焦点。

即便占比较小的外聘物业公司,也充斥着不少“皮包公司”,这些公司将小区当做“提款机”,往往只提供保安、保洁等表面服务工作,并不具备专业服务能力。

由于监督管理缺位,许多矛盾从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转移到居民与政府之间,成为政府服务热线、信访、法院必须面对的难题。

再来看业主委员会的“跛脚”问题。

作为业主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业委会应该是监督小区物业服务的法定主体。然而在现行法律中,因其不具有法人资格,没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和物业公司的营利法人身份相比,业委会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法律地位。

同时,业委会作为公益性质的自治组织,成员大多缺乏物业管理专业知识和能力,对物业服务管理监督乏力。

现实生活中,社区业委会存量比较少,基本上是在居民利益遭到损害时,不得已推选产生,所以,业委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先天的脆弱性。加之绝大多数居民并不关心公共事务,缺乏群众基础,业委会容易产生难、生存难自然成为一种现实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物业服务引导融入社区治理工作?不少地方积极探索党建引领路径,依托街道、社区,通过创建红色物业、在小区业委会建立党支部,推动社区“两委”和物业公司、业委会人员双向融入,推动社区“三驾马车”联动,化解矛盾纠纷。

但是,从根本上讲,治理物业纠纷,提升社区治理能力,还是要从完善法治制度着手,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主体地位,强化物业企业的市场化引入机制,依法加强监管,杜绝物业企业招聘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近亲繁殖,确保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公平匹配,通过良法善治,保障和维护广大居民的利益不受侵害。